

丛书总顾问：潘懋元
丛书总主编：刘海峰

“弦歌不辍”系列图书

抗战烽火中的 厦门大学

石慧霞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KANGZHANFENGHUO ZHONGDE XIAMENGDAXUE

抗战烽火中的厦门大学

石慧霞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烽火中的厦门大学/石慧霞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7
(弦歌不辍: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ISBN 978-7-5649-2084-5

I. ①抗… II. ①石… III. ①厦门大学一校史—1937~1945

IV. ①G649.28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2645 号

责任编辑 程新晓

责任校对 任瑶瑶

封面设计 郭 灿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22864495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32 千字

定 价 3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 序

刘海峰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随着平、津、沪、宁相继陷落,华北、华东沦入敌掌,多数高校遭到日寇破坏,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抗战烽火中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日本侵略者深知大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中国所有大学都是抗日基地”,所以,对占领地的中国大学肆意加以破坏,如摧毁南开大学、炸平厦门大学靠海的建筑等;对转移到后方的大学也不时进行轰炸。当时,多数高校被迫西迁,西北达陕甘,西南及云贵,中部溯江而上至四川各地,途中交通不便,加上敌机狂轰滥炸,许多高校一迁再迁,颠沛流离,历经磨难。

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备受摧残的情况下,教育工作者不辞千辛万苦,坚持办学,使抗战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有发展。抱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国民政府实行“平时作战时看,战时作平时看”的方针,大力保存和发展高等教育。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所载历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概况统计表,1936年之前,中国有高等学校108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78所、专科学校30所,在校生41922人、毕业生9154人。到1937年,减少至91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67所、专科学校24所,在校生31188人、毕业生5137人。而到1945年,竟然有高等学校141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89所、专科学校52所,在校生83498人、毕业生14463人。也就是说,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没有衰败,反而得到了大发展,1945年比1937年的高等学校增加了50所,在校生数增加了1.68倍,毕业生数增加了1.82倍,比1936年也有很大的增加。在异常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中国高等教育取得这样的发展,不能不说是教育史

上的奇迹。

而且,在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办法纲领》和《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等抗战时期教育政策的指导下,此一时期的大学国立化进程不仅没有受阻,反而在逆境中得到长足发展,抗战时期及抗战复员阶段设立的国立大学特别多。抗战时期新设或改为国立的大学有10所,抗战胜利当年和次年新设或改为国立的大学有6所。此时期的高校励精图治、人才辈出,对于国民教育的维持、传统文化的延续、现代知识的传授、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抗战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建设人才的培养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抗战时期绝大多数高校师生都有一种爱国自强奋发向上的精神,许多高校在艰苦的条件下卓绝奋斗、弦歌不辍,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抗战时期的多数高校担负起了对文化传承负有的责任,树立起了大学精神的伟大丰碑。

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都经历过特殊的磨难,都有一段传奇的历史,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传承着民族文化的血脉与灵魂,表现出民族精神的不屈与奋进,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乐章。其故事值得传播,其精神值得弘扬。现今我们到一些相当僻远的战时西迁办学高校的遗址参观,往往会感叹,这些地方即使是现在也仍然交通不便,可以想见当年许多民族精英经过长途跋涉,多年僻居其中,生活会有多么艰辛。然而,当时大学师生物质生活虽然艰苦匮乏,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仍然创造出了辉煌的业绩。

今天,抗战的硝烟早已远去,但中国高校在抗战岁月中显现的大学精神和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仍然在激励着当代中国教育工作者。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这套“弦歌不辍——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系列图书,我认为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者,愿共襄盛举,故草数语,以为书系之引。

2015年7月29日

序

潘懋元

作为一种共同理念和文化心理,大学认同是大学成员对所在大学的自豪感和对大学发展的信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特定学校的心理依恋感和文化归属感。大学认同是大学办学成功的重要标志。

以爱国华侨陈嘉庚精神办学的厦门大学,其成员群体由于对陈嘉庚的景仰与感恩,认同度较高,尤其是在民族危机的抗战时期,在校师生、校友的认同度更高。我是当年的在读学生,家在沦陷区,四年寒暑,都生活在校园中,厦大于我,既是国的具体化,又有家的温馨感。

本书作者石慧霞博士,对厦大历史研究有素,与历届毕业校友有着广泛联系,尤其是对抗战时期的厦大历史和当年的校友,情有独钟。她用力发掘并精心整理了这段时期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对当年的毕业校友进行了深度访谈,深入研究了校长、教师、学生、校友等不同主体对厦大认同的历史过程及内在机理,并将这所学校的历史置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书中多处体现了她对大学认同的特点、路径的思考,渗透了她对民族危机与大学认同的理解,完成了她的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于2010年12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答辩。答辩委员会认为:“论文选题视角新颖、独特,具有学科前沿性、开创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现实价值。论文框架结构清晰,史料工作扎实,立论深入浅出,文笔简洁流畅,反映了作者掌握了较为扎实、宽广、系统的教育基础理论和全面、深入的专业知识,学术视野开阔,理论功底深厚,是一篇情理交融的学术著作。”本书是著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切磋、研磨修改而成的。

作为抗战时期厦门大学的历史见证人和作者的博士论文导师,我很高兴这样一部对大学文化有价值的研究专著获得丛书评委的一致好评,得以资助出版,特此推荐并为之序。

2012 年 1 月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抗战前厦门大学认同历史回顾	(25)
第一节 陈嘉庚“虔诚”兴办厦大	(26)
第二节 大学认同危机	(31)
第三节 大学认同危机的化解	(38)
第二章 萨本栋：民族危机中的大学校长	(50)
第一节 人格魅力	(51)
第二节 选址长汀	(62)
第三节 制度认同的建构：以 108 次校务会议记录分析为中心	(72)
第四节 学科认同的建构	(83)
第五节 大学共同体的象征	(88)
第三章 战火中的教师生态：热爱与坚守	(94)
第一节 教师概况	(94)
第二节 在教书育人中认同大学	(107)
第三节 在文化体验中认同大学	(117)
第四节 在迁徙流转中认同大学	(123)

第四章 清寒学生的幸福生活	(126)
第一节 学生求学背景	(127)
第二节 润物无声的人文关怀	(134)
第三节 严谨活泼的学风熏陶	(139)
第四节 爱国爱校的家国情怀	(147)
第五节 激情浪漫的课余生活	(150)
第五章 患难与共:校友与母校在一起	(155)
第一节 校友认同表征:以《厦大通讯》词频统计为例	(156)
第二节 校友大学认同的阶段分析	(169)
第三节 校友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	(174)
第四节 大学认同促进校友成才	(181)
第五节 传承认同“反哺”大学	(197)
第六章 民族危机中的大学认同之省思	(201)
附录	(210)
附录一 长汀厦大学生档案图例	(210)
附录二 学生口述抗战中的厦门大学	(217)
参考文献	(238)
后记	(263)
再版说明	(267)

导 论

一、研究缘起

认同是关涉个人与组织(群体)隶属关系的一个概念,是任何一个组织获得成功的基础,大学也不例外。大学认同是指大学成员在心理与行为方面与其所在的大学具有一致性,并且成员觉得自己对大学既有理性的契约感和责任感,也有非理性的归属感和依赖感,以及在这种心理基础上表现出对大学发展尽心尽力的结果。大学认同是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学保持长久和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为什么有的大学悄然消失,而有的大学则充满生机与活力?中世纪欧洲最早创办大学时,“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及其模仿者幸存下来,而在萨莱诺的更早的和同样有前途的努力却消失了。”英国历史学家科班指出:“萨莱诺的主要弱点在于它没有发展一个保护性的有凝聚力的组织以维持它的智力活动的发展。”^①当时大学已认识到在与教会、市民的斗争中,在争取权利的斗争中,团结起来的力量之重要。大学通过各种仪式强化人们对大学的认同感,无论是初入大学还是授予文凭,都有相对应的仪式。大学通过

^① 伯顿·R. 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认同感的强化,建构集体的力量,以承受和应对外界的压迫,保持大学社团的团结和独立。总而言之,中世纪大学是自治的、在内部有认同感、外部被承认的、以校长为法人代表的从事普遍学问研究的学术性机构。^①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从产生发展到成员归属感、认同感的形成,始终伴随着知识分子的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抵御外侮、救国图存的努力融入到其大学价值观和教书育人当中。事实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读书人几千年来最大的使命。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事关国家民族的命运,大学人渴望实现民族振兴、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令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发扬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团结奋斗的精神。

进入现代社会,大学具有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相对充足的办学资源和较为优越的办学条件。但不能否认的是,大学认同也陷入危机之中:师生间充满情感的对话和交流越来越多地被客套的、彬彬有礼的契约关系而取代;神圣的学术殿堂内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冲突不断;多元化的教育氛围中缺少共享的情感体验和共同的价值追求。大学目标模糊,瓦解学校组织的因素越来越多,学校组织的向心力越来越弱。

回顾历史,同样是在民族危难时期,有的学校由于认同度低被迫解散,如西北联合大学联合不到半年就解散了;有的学校接连爆发师生驱逐在任校长的风波^②。这一时期的大学史,吸引了一批学者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然而,其重点对象主要集中在西南联大,成果可谓卷帙浩繁,但迄今为止对同一历史时期其他著名大学的关注并不多。^③厦

① 参见李秉忠:《中世纪大学的社团性结构》,引自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4页。

② 苏云锋:《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页。

③ 潘懋元,石慧霞:《长汀厦大与西南联大之比较》,《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门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独资创办的大学,战时独避闽西长汀,尽管当时刚转为国立的厦门大学经费最少,但师生协同共进,形成强大合力,为维持和发展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现有的研究对这段历史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1937年,陈嘉庚企业收盘,系科紧缩、风雨飘摇中的私立厦门大学转为国立,在国立首任校长萨本栋的领导下,全校师生举校内迁闽西长汀办学八年,校史一般称这一时期为“长汀时期”,与本研究“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基本是同一历史时期^①。其时的厦门大学,“各部分办事精神连贯,通力合作”,^②众志成城、患难与共,形成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组织向心力,学校像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大学成员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培养出一批杰出人才,使得大学声誉大振。战时厦大被国民政府称为“国内最完备的大学之一”^③,并被学者誉为“加尔各答以东最好的大学”^④。厦大从迁校时的文、理、商学院9个系到1945年增至文、理工、法、商学院15个系,学生从内迁时196人,到1945年时发展成为1044人。^⑤与战时集聚西南大后方的高校不同的是,厦门大学始终在东南一隅办学,没有并校、没有改名,始终保持了组织机体的完整和独立。战争条件下,办大学之艰苦难以想象,更难的是大学成员

① 以严格的历史时间计算,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与厦门大学长汀时期略有出入: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厦门大学长汀时期是指1938年1月厦门大学举校迁至长汀,1946年12月迁回厦门时期。因抗战爆发与厦大内迁长汀存在因果关系,厦大师生及校友一般将这两个时期等同视之,并习惯以“长汀厦大”简称。为了对抗战时期厦门大学的大学认同进行更清晰的说明,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将向前进行必要的追溯,也将向后作必要的延伸。

② 《教育部令奖母校教学认真学风纯正》,《厦大通讯》第四卷第五、六期,1942年6月30日。

③ 厦门大学校史编写组:《厦门大学校史纲要》(上编),1986年版,第12页。

④ 1944年3月,美国地质地理学家葛德石造访长汀厦大,曾作公开演讲,并为选修经济地理学课程同学讲学。葛氏参观厦大后“称赞不置”,谓“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个大学”。参见《厦大通讯》六卷三期,1944年3月31日。

⑤ 洪永宏编著:《厦门大学校史》第一卷(1921—1949),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

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危机。引起笔者进一步思考的是,“战时厦大成员拧成一股绳,形成了高度的大学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大学认同的具体表现如何?体现在不同主体身上如校长、教师、学生、校友与大学的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在大学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究,无疑对于进一步丰富抗战时期中国大学办学历史和特色的研究,对于大学组织文化特色的理解,对于现代大学认同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引发笔者研究抗战时期厦门大学认同的另一个重要缘由,也可以说是情感根源是:笔者的思想和生命轨迹,深受抗战时期厦大成员对这所大学情感和精神的渗透和影响,使我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由衷的敬意,进而萌生强烈的研究冲动。

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始于1997年。当时笔者刚从厦门大学本科毕业,留校从事校友联络工作,接触了许多自称为“老长汀”的厦大校友。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均已过花甲之年。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参加他们的返校聚会活动,为他们在母校捐建楼堂馆所、设立奖助学金“跑腿”。其间,常常听他们忆起大学时的校长、老师、同学。刚开始,觉得是遥远、新奇的“故事”。耳濡目染,2001年校庆,笔者因遇到一点小挫折,情绪不佳,刚巧被回厦大参加校庆的一位“老长汀”发现,他细心和真诚的引导化解了我的烦恼。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突然感觉自己与这些“老长汀”不再有距离感,甚至他们当年的所有经历和故事,于我而言,有了特殊的亲切感。2002年夏,厦大举行纪念萨本栋校长百年诞辰,曾化解我烦恼的学长因病无法回母校,他在病床上写了《永怀恩师,萨公本栋校长》一文,打越洋电话过来,请我帮他打印成电子文稿。过了几个月,传来他病逝的消息。笔者与“老长汀”的接触越多,越深切地感受到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强大的师生凝聚力和爱校热情,也使我萌生了探究“他们为何如此热爱和忠诚于母校”“高度一致的大学认同是怎么形成的”等问题。正是带着对“老长汀”的敬意和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我开始了自己的博士生生活。

一般来说,大学认同是大学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这

个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从宏观上研究时代背景、社会因素对大学认同的影响,另一方面要深入到大学内部,从微观上分析大学认同形成的内在机理和互动机制。相比于宏观分析,微观研究可以具体考察大学文化传统、特色对认同的影响,可以观照到大学内部不同主体的思想、心理活动、日常行为和习惯、生活体验等,能够从动态上来看待大学认同的形成过程,洞悉大学认同体现在不同成员身上的特点和规律等。令笔者有信心从微观视野推进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工作之便,笔者收集了大量抗战时期厦大的相关史料、校友回忆录、校友访谈笔记。特别是2009年暑假,笔者在厦门大学档案馆查阅抗战时期厦大的档案文献^①,发现大量的原始文献,而相比之下,已有的研究分析却比较匮乏,然而,这正是研究者最感幸运的事。笔者相信,学问不是一种神秘的彼岸言说,它就是此在,是此在的种种生活;我一直渴望能够力求沟通学术与生活,我相信即使是历史研究,如果在研究中,看不到研究者的语言和思想,看不到研究者的情感与心灵,看不到研究者的生活史和风格,这样的研究对于研究者,不能不说是最大的遗憾。基于个人的浓厚兴趣和对“我的母校”这段历史的尊重和敬意,笔者下定决心选择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并深信,把理论和史实的探讨与切身感受和体验分析融合在一起,将使学习过程变成生命体验的过程,将使学习成为真实美好的生活。

^① 抗战时期厦大内迁长汀的原始档案资料保存较为完整,原始档案资料包括历年概况介绍、教师统计、学生个人档案、萨本栋校长个人信件往来、历次校务会议记录、训导会议记录、教务会议记录、大事记记录、1938—1945 学校所发布告、厦大通讯、厦大学报等等。卷宗号详见参考文献(一)。

二、大学认同研究综述

(一) 认同的内涵

认同指的是个人以群体(或组织)中的一分子的身份来界定自己。^① 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 *idem*(即相同, *the same*)。^② 关于认同的研究多见于心理学、社会学理论大家的著述中。弗洛伊德和米德是从微观的个体心理学方面认识认同问题的。弗洛伊德于 1915 年,在《悲哀和抑郁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这篇论文中,第一次提出“认同”这个术语。弗洛伊德最初的关注点是抑郁症这种特殊的病理状态的关键机制,只是随后他才把“认同”的提出看作是重要的。在这篇论文中,“认同”替代了个体投入力比多(*libidinal*)能量(性本能, *athexis*)的一个对象。认同被看作是在自我设法“吞没”(devoul)客体的过程中的一个初步阶段。米德认为,“自我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是它自己的一个对象,并且这一特征把它与其他对象区分开来”。因而,自我既是“主体也是客体”。然而,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自我作为一个心理建构是如何产生的。米德从“主我”和“客我”的分析中,认为“主我”在对“客我”的吸纳与认同中构建了一个社会的自我。弗洛伊德和米德的研究主要都在微观心理学层面上,其对认同的研究也主要属于“自我认同”。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对认同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的探究,并且把这个术语带到公共使用的范围中,尤其是与认同危机这个术语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认同并不是一个可由观察者做出客观估价的存在状态,

① 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1 页。

② 张向东:《认同的概念辨析》,《湖南社会科学》,2006 年第 3 期,第 78—80 页。

认同感是一种社会心理稳定感,它明显的伴随物是身体的无拘束感,一种知道自己正在向何处去的感觉,以及对预期将获得那些重要人物承认的内在信心。个人的认同包含一个主体不断地延续自我的一种感觉,此延续的过程也就是认同不断改变的过程。一个成熟的心理认同的渐进发展是以人所属的团体为条件的,而团体的传统价值对个人的成长意义非常。当个人与一个团体认同时,他会接受此团体的价值与规范以影响自己的行为 and 态度。

社会心理学对认同的基本解释是将认同看成群体关系的系统。每个人属于不同的群体,而每个群体作为一种社会认同标识代表着个人意识。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群体,属于这些群体的个人经常以这些群体成员的一份子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这样的自我界定和归属,是形成个人社会态度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心理学家米勒指出认同的本质不但是“心理”的,它也包含“群体”的概念,是一项“自我的延伸,是将自我视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①。这是认同的核心。乔治·米德则强调了认同的社会制约性——在他看来,社会的我具有双重的特性,是个人行为 and 团体行为二者的结晶体,自我与社会不能分离,经由与他者的互动以及规范性的影响,自我乃由社会所建构^②。也就是说,在米德看来,认同是主体选择性与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个体只有融入社会团体并与其他成员进行交往,才能实现个人的认同。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则认为认同是社会给予、社会维系和社会传递。他指出:“每一个社会都具有一种认同的保留,这种认同是社会成员客观知识的一部分。正如个体社会化一样,这些认同也被内化。他们不仅仅被认为是客观现实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个人自我意识不可或缺的部分。被社会定义的客观现实却被主观地占有了。换言之,社会化带来了主、客体现实之间以及主、客观认同之间的对称。伴随着心理现实的

① Miller, warren E. and J. Merrill Shanks. *The New American Voters*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athan, James A. and Richard C. Remy, 1996.

② 孟樊:《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台湾,杨智文化事业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12页。

附属物的认同总是特定社会结构世界的认同。一个人认同自己,也就是处于一个平凡世界被别人认同”^①。这里,伯格强调个人通过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构造了社会,并为他们自己的行动筹划赋予了有效的意义。社会学家帕森斯则把认同定义为“个性模式保持代码系统”^②,按照这个定义,认同通过相连贯的组织内有关个体的信息来维持个体的连续性。而社会学家汉斯·摩尔认为:以个人层次而言,认同是一个人在混沌环境中所占据的稳固方位,个人能够据之对外在环境做出积极的防御;在社会层次而言,认同是一个基本的及普遍拥有的信仰、模范及价值之综合,它能抵抗外在事物对本身环境与成员的威胁及继续自身^③。所以,在摩尔看来,认同不但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边界”。在哈贝马斯那里,他提出满意的群体认同是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前提。哈贝马斯关于认同的研究走向了宏观,认同成了一个关系社会秩序的问题^④。

认同问题在后现代研究的框架中是重要且时髦的课题,众多学者不仅从理论,而且从现实的层面上探求其发展的脉络与底蕴。后现代学者韦克斯(Jeffrey weeks)这样描述认同:“认同乃有关于隶属(belonging),即关于你和一些人有何共同之处,以及关于你和他者(others)有何区别之处。从它的最基本处来说,认同给你一种个人的所在感(a sense of personal location),给你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以稳固的核心。认同也是有关于你的社会关系,你与他者复杂的牵连”^⑤。

从以上关于认同内涵的探讨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早期心理学还是

① Beit-Hallahwi. B. *Cnolegomena to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London, England: Associated University, 1989, P94.

② Beit-Hallahwi. B. *Cnolegomena to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London, England: Associated University, 1989, P95.

③ Hans J. Mol. *Identity and the Sacred*. The Free Press, N. Y., 1977.

④ 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⑤ Weeks, Jeffrey. *The Value of Difference*, in Jonathan Rutherford(ed) *identity: Community, Ident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ishart, 1999, p88.